



新视界

科幻文学是联结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立足文化强国建设，科幻创作与理论研究亟待面向前沿、回应时代、深化学理。本期聚焦人工智能时代，探讨中国科幻的理论建构、创作路径与价值引领，剖析科幻文类特质、时代书写课题与技术伦理边界，体现出科幻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与文化担当。

——编者

发现客体之海 找到巨型宾语

□施战军

近些年，我曾多次重申自己的一条观察心得，即科幻文学其实是今天的“文学正典”。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早已难以承载今日人类面临的科技剧变与生存困境，科幻作家正以勇毅的英雄主义担当起对生命处境的探问。2025年，在成都第二届“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成果发布会的致辞中，我也谈到，在已有与未知之间、生命与情境之间、科学与哲学之间、新故事与大故事之间，皆可科幻。“我们的科幻文学，就处在新故事的创制向大故事的建构发展的阶段，由我们的经验积累、写作理想和文学使命决定，最应有所作为的关键时期已经到来。”

从刘慈欣到陈楸帆，中国科幻作家始终将技术变革与人的价值、文明出路紧密相连，在算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持续追问生命去向。这种写作不同于西方主流文学对宏大责任的回避，而是重新接续了从托尔斯泰、雨果到海明威的方位感与方向感，在迷茫中依然寻找精神的锚点。当前，中国科幻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引领之势，不仅拥有坚实的创作队伍与平台支撑，在“史的研究”“诗的分析”“势的观察”三个维度也日趋完善。

当然，我也曾对科幻创作中存在的有幻无科、低龄化等问题，陈述过自己的担忧。如今回望，这份担忧可能源于自身固化的“经验论”。在密集阅读当下青少年科幻作品后，我愈发清晰地重新认识到，每一代创作者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青少年群体更有着专属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世界体察。

好的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先有创作题目，再去拼凑人生经验。对于青少年而言，或许人生长度尚短，过往阅历尚浅，但这绝不意味着经验是一片空白。这代年轻人成长于全新的时代，拥有着前所未

有的时代敏感，这份独特的感知力，就是最珍贵的创作源泉。

这代年轻人被称为“网生代”“Z世代”，不无道理。他们自出生起便与科技相伴，各类科技产品融入日常，全新的科技思维塑造着认知方式，这些科技产品如同新的器官、新的习惯，深刻且直接地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对生活的表达。

数智交融让经验交叠，如今的青少年写作者比任何一代作家都更加“早熟”，这份经验早已深深走入人心、形同骨肉，成为创作中与生俱来的独特底色。没有过多传统创作的影响焦虑，没有沉重的创作桎梏，这正是青少年科幻写作最宝贵的优势，也让年轻的科幻创作拥有了探索飞翔的可能。

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人工智能在汇聚人类智力成果的同时，也显著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网络热词的便捷化表达导致文学诗性淡漠，深度思考逐渐被图像化信息接收取代。AI速读、有声书、短视频名著解析等新型阅读方式，虽然提升了阅读便捷性，却难以让我们完整感受作品的深意与魅力。唯有沉心阅读，方能体会文学的真正价值。比如，我们只有深度沉浸式阅读《红楼梦》《万有引力之虹》等“大部头”，方能从中汲取处世智慧，激活想象力，提升审美素养。

面对当今种种变化与挑战，我愿意与年轻的科幻创作者们一同探讨，在全新经验的摄取与积累中，青少年科幻的创作路向。

——在我们习以为常倚仗主语、任由主体浊浪排空的时候，对正在建构新正典原则的科幻创作而言，客体之海的发现与艺术处理成为更切要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勇敢找到创作中那些隐秘的巨型宾语。宾语意味着哲学向度和审美方位。宾

语落实，才可去挖掘那些形态各异、彼此光影纠缠、极具生命力的具象表达。科幻创作从不是空洞的想象堆砌，而是要找到扎根于内心、联结着时代的核心意象，用具象的笔触勾勒出属于未来、属于当下的科幻世界，让每一个文字都有力量、有根基。

——年轻人笔下的新一代科幻文学，可以兼具崇高与深情，饱含勇毅与雄浑。科幻并非冰冷、遥远的叙事池，对生命的敬畏、对文明的坚守、对美好的向往是科幻作为文学必备的情愫。在科技硬核基础上，在天马行空的想象里，守住内心的赤诚，有温度、有情怀、有风骨、有力量，科幻认知的锐利才有可能与文学故事的诚挚相互成就。

——科幻题材无比多元。无论是专注传承的文明科幻、彰显底蕴的文化科幻，还是聚焦本质的生命科幻、历经沧桑的情感科幻，亦或是险象环生的营救科幻、超前探秘的新质科幻、探究自我的认知科幻，以及直面现实的病变科幻、寻绎内核的价值科幻……都值得去尝试、去深耕、去创造。科幻创作需要不断破题，但并非没有大的边界。守住科技硬核的专业底色，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也许不必遵循“贴着人物写”的规则，但应塑造出丰满立体、护生悯命的整体形象。

科幻创作是科学逻辑、文学光谱、精神镜像的合体。青少年是科幻创作的未来，拥有着最鲜活的时代经验、最炽烈的创作热情。愿这样的创作始终一方面以这些与己相关的一切为直接创作养分，一方面以那种为伟大文明而勇于担当的英雄主义为创作动力，不断积累属于这个时代的鲜活经验，永远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对彼岸的向往，激励自己不断向着未来、向着理想，诚恳写作、勇敢表达。

(作者系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

优秀科幻小说该是什么样的？

□汤哲声

科幻小说是当下中国备受关注的类型小说之一，创作量极丰。究竟什么是优秀的科幻小说，见仁见智，各有所爱。在我看来，优秀的科幻小说应当有三个标准。

一是阐释当代前沿科学。科幻小说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文学想象，阐释科学技术是其本体特征。科幻小说一般都在阐释科学技术，但是优秀的科幻小说一定是当代前沿科学的阐释者。纵观世界科幻小说的发展史，无论是黄金时代、新浪潮，还是赛博朋克、阿瑟·克拉克、弗兰克·赫伯特、菲利普·K·迪克等作家的作品之所以成为时代的标识，不在于他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而在于他们所关注的科学技术的前沿性，在于他们在太空探索、心理科学、网络信息等时代前沿科学阐释中展示的人类生存状态，并从中显示出科幻小说的时代引领性。

研究前沿科学对科学家来说是挑战，阐释前沿科学中的人类生活对科幻小说创作来说也是挑战。0到1是创新，1到10是惯性，只有创新才能产生经典，而前沿科学的阐释才能给科幻小说经典的生产提供最大的可能。刘慈欣在2024年第八届中国科幻大会上曾说：“随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空间探索等前沿科技的发展，科幻文学的素材和深度正在不断丰富，这不仅为科幻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还对科幻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确实如此，当下世界科学发展正在进入新的时期，这给科幻小说的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也给科幻小说经典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是具有科学思辨与科学逻辑的科幻想象力。科学思辨与科学逻辑是科幻小说姓“科”的根柢。我们认为，天瑞说符的网络小说《我们生活在南京》属于科幻小说，是认可小说具有科学思辨与科学逻辑。1887年，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在实验室完成了电磁波实验，证实了人工电磁波的存在。

小说里写道：“这一天，人类有意识地朝宇宙主动发出了第一道电磁波。”这道电磁波尽管很微弱，但它还应该存在于天地之间。于是，小说所构想的时空穿越就有了科学思辨与科学逻辑。

同样是时空穿越的想象，猫腻的网络小说《庆余年》则属于玄幻小说，因为小说中的时空穿越是精神幻想。科幻小说当然需要想象力，想象力是科幻小说的精神脉动，但绝不是文体标准。这个看似基于常识的认知，却是当前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与创作需要辨析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人类的一切想象都将被科学证实，所以玄幻就等同于科幻。这样的观点在玄幻小说研究者和作家中很容易得到认可，不能说它不正确，因为人类对科学的认知无穷尽，也许今日的玄想就是明日的科幻。例如人脑机接口，10多年前也许就是玄幻，但在当下正成为现实。但是科幻小说创作却有基本的文体要求，那就是想象力的发生机制。这个发生机制就是科学思辨与科学逻辑。科幻小说的科学思辨与科学逻辑可以是既有的得到科学认证的科学知识，也可以是具有探索形态的科学推理，当然也可以是创作者所设定的科学推断，但无论是什么形态，科学思辨与科学逻辑都清晰可见。如果小说没有科学思辨和科学逻辑，只有想象力，这样的想象力再丰富，也只能说是玄幻小说。想象力并非只有科幻小说独有，所有的文学创作都需要想象力，发生机制却是文体认知的基本标准。科学思辨与科学逻辑是科幻小说的认知标准，如果去掉科学思辨与科学逻辑，科幻小说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只看到想象力，而看不到发生机制，那就是本末倒置。

三是具有深刻的人生思考。将人置于小说的中心，并进行深刻的人生思考是世界科幻小说发展的总体趋向。新浪潮和赛博朋克的科幻小说之所以能够引领科幻小说的新时代，是这些小说将人和人的生存状态置于小说呈现的中心。刘慈

欣的小说被认为与世界科幻小说接轨，是因为他的每一篇科幻小说几乎都有现实的哲理思辨。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深刻的人生思考和社会思辨，并努力将读者引入历史和哲学的空间，但是不同的文类有不同的思考路径和思考空间。科幻小说是以人类为单位在宇宙中进行生存思考，它思考的是人类所生存的星球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思考的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起源、现状和消亡。所以说，科幻小说的思考是地球思考、人类思考、人类与宇宙中的他者关系的思考，并从中寻求一些规律性的问题。科幻小说的人生思考的路径是基于科学思辨与科学思维的科学推导。与其他文类关注“好与坏”的社会批判性思维不一样，科幻小说关注“能与不能”的生存思维。以近年来受到世界科幻小说研究界认可的俄罗斯作家谢尔盖·卢基扬科科的《星星是冰冷的玩具》和韩国作家金草叶的《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为例，两部小说最后的哲学指向都是“现存即最好”。《星星是冰冷的玩具》的科学思维是让“几何学家”“暗影”“地球”三个星球在宇宙中碰撞对比，得出了成长中的地球是最好的星球的结论。《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的科学思维是在变与不变的科幻想象中得出当今的社会环境是最适合于现时的弱势群体的生活环境。

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成长为优秀的科幻小说家并不容易，需要具有认知当代前沿科学的敏感性，掌握科幻小说创作基本规律的原则性以及成为哲学家的可能性。中国科幻小说能否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不在于创作量有多少，而在于作品有多优秀。对于这一代科幻作家而言，时不我待，机不可失。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类型文学传承创新与海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5&ZD077)阶段性成果]

AI是人类自我表达的新技艺

□宋明炜

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每一次科学范式发生改变，新技术影响整个文明进程时，都会引发一种忧虑甚至恐慌。当今天我们担心AI的出现会导致文学的覆灭时，我们该在何种程度上理解柏拉图？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对技艺(technic)表达忧虑。他此处所言的技艺并非如今语境里狭义的技术(technology)，而是文学技艺(craft)。表现的艺术是人类表达的最基本的技术，在雅典集市上，苏格拉底对雅典公民热衷于修辞术和悲剧的艺术，提出一种对“技术”的警惕，作为技艺或技术的文学，可能会让雅典走向堕落。

语言、修辞、文学表达皆可作为一种“技术”来看待，但我们今天当然不会简单地认为这种“技术”就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语言以及整个人类建立的其他符号系统，文学以及整个人类塑造的文学体系，几乎等同于人类自身的总和，因为它们与人类的情感、思想、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但当我们把文学与语言学画上等号的同时，我们是否有意识地将语言、修辞、文学表达的技术性层面以及物质性层面都排除在等式之外了？至少19世纪、20世纪的哲学家们都试图避免这样一种简单的排斥机制，但同时又要处理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的挑战，因此我们有了所谓的人文学的边界，但凡有了边界，就更加深了忧虑。

在此，我想提醒的一点是，AI可以作为一种技术，但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语言。如果稍微逾越人文学边界的束缚，我们可能会发现AI仍然是一种人类的表达技术，即便制造AI的程序也是一种语言，仍然是人类的符号系统之一。我们可以用苏格拉底的论辩方式来反驳他的判断，即“技术”也许会让雅典人背离理念，但在此后的漫长世纪中，“技术”不断地丰富人类的表达。我们早已生活在英国科学家查尔斯·珀西·斯诺所谓“两种文化”的时代，即科学与人文成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但恰恰当我们回顾苏格拉底论辩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技术”仍回归到人文学的底层逻辑之中。

人类对AI的恐惧与忧虑的底层逻辑，指向的是人类对自身的恐惧与忧虑。比如，有一些观点认为，用户对AI的过度依赖会导致自身判断力的降低、主体性的崩溃以及情感的物化，甚至据说已经有人和AI谈恋爱。当然我们知道与AI谈恋爱的人，只是在一个回路中不断地输入和收取相同的情绪和情感表达。也就是说，与AI谈恋爱的人，只是在寻找一个“回声”(Echo)。

人类恐惧的根源还来自人本身。很多科幻小说和影视都将AI(包括“机器人”“仿生人”“硅基人”)浪漫化了。在过去200年的历史中，人造人成为人类寻求他者影像的想象力投注对象。机器人(Robot)在最初是资产阶级的他者形象——无产阶级。“Robot”这个词来自捷克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科幻哲理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当全世界被作为劳工而无情剥削的机器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这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欧洲引起的恐惧，已经给“Robot”这个来自捷克语“Robota”(劳工)的词汇染上了浪漫化的色彩。机器人在此后的流行文化中必须被加以制约，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原则”就是要起到禁绝机器人革命的可能性。

大萧条时代即将到来之际，德国电影《大都会》让机器人形象拥有了明确的女性性别特质。女性机器人玛莉亚成为另外一种浪漫化的表述，她代表鲜明的时代精神，裹挟着情欲沉沦与道德失序的批判意味，成为对魏玛时代社会秩序的挑战。然而，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维度是，1950年，当英国科学家阿兰·图灵在设计图灵测试的时候，并不只有“人”与“机器”的物种差异，还有“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差异，这在“模仿游戏”(imitation game)中，图灵提出，让三个人来玩这个游戏，一个男人(A)，一个女人(B)，一个不限性别的提问者(interrogator,C)。仔细考量图灵的最初设定，会发现这里有两重模仿游戏：一层是模仿女人的男人，一层是模

仿女人的机器。在这个游戏中，机器要模仿的不仅是人，而且是特定性别的人。然而，模仿游戏中所隐含的性别意涵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后来的研究者选择将原假设中女人、男人、机器的三者关系，简化为人与机器的二元关系。这个细微的性别特征提醒我们，图灵具有性别自觉的意识，而此后的科幻作品中，无论是《机器姬》还是《Her》，女性机器人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人类的道德与知识系统。

在阶级、性别之后，后殖民时代的科幻开始了人工智能的种族书写。好莱坞经典科幻电影《人猿行星》、美国黑人女性科幻作家奥克斯塔维娅·E·巴特勒的小说、瑞典科幻电视剧《真的人类》等都用人物的形象来体现种族问题，这是又一次通过人工智能表达的对于秩序和体系的挑战。美国科幻剧《西部世界》则以多样性的性别和族群来体现机器人革命的暴力实则是出于人类设计者的阴谋。到此，机器人、仿生人、人工智能在三个重大现代范畴(阶级、性别、种族)中都成为了关键的喻体。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我们为什么对AI感到恐惧？为什么对机器奇点(singularity)的到来感到忧虑？因为，我们的恐惧和忧虑中映射了人类在现代性经历中的种种问题。迄今为止，AI在资本领域制造的变革不亚于在技术层面，真正令我们恐惧的，也许是人类社会对AI技术的浪漫化误读与排他性防御，将导致人类制造新的阶层化、性别对立、族群互斥。

然而，我们依然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透视事物发展的本质。AI作为一种技术和修辞术作为一种技术，当然是两回事，但人类难道不是被上万年的语言和表达符号演变塑造出来的吗？如果修辞术可以造就一个令苏格拉底感到不安的雅典公民，AI是否也会生成别样的人类？怎样的“别样”姑且不论，AI开启的可能性，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认知自己，以及打开其他生命与知识的可能性。

AI作为人类发明的技术，如果最终将改变人类，这会是另外一种生成的过程。我们对于AI的恐惧的另一面，也正是我们对AI的迷恋、浪漫化与深层心理中的认同。或许正因为此，最后，AI才可能成为人类自我改变的契机。

(作者系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讲座教授、系主任)